

民俗学的重建与发展

—江苏民俗学研究 20 年

唐茂松

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江苏民俗学研究的历程，指出江苏学者为中国民俗学的创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。同时，重点论述了近 20 年来，江苏学者为重建和发展中国民俗学所取得的基本成绩：一是组织学术队伍，建立民俗学的研究和展示基地；二是深入民间，开展社会调查和采风活动，搜集第一手的民俗资料；三是树立良好学风，认真进行民俗学的专题研究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；四是举办多种形式的民俗展览活动，普及民俗文化知识，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。

关键词 江苏 民俗学 重建 发展

江苏的民俗有悠久的历史传承，又多姿多彩而富有特色。连云港将军崖的原始社会岩画和土地崇拜遗迹、海安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易卦刻文，以及汉代司马迁《史记》的对周太伯、仲雍奔吴，“荆蛮文身断发”的记述，是现存最早反映江苏地区古代民俗的珍贵实物遗存和重要文献记载。晋代周处记录苏南宜兴地区风俗的《阳羡风土记》，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民俗志书，在世界民俗史研究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对历代江苏民俗事象的采集记述，除各种地方志中的《风俗篇》外，还在大量的笔记、话本、游记，乃至小说、戏曲、竹枝词等作品中，有许多涉及民俗风情的生动描写。所有这些，都为研究江苏民俗积累了宝贵资料。

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正式形成。江苏学者为此作出了杰出贡献：1918 年刘半农（1891-1934 年，江苏江阴人）和钱玄同等在蔡元培支持下发起征集全国歌谣活动，揭开了创建中国民俗学的序幕；同年顾颉刚（1893-1980 年，江苏苏州人）对吴歌的采集整理，以及他在 1925 年组织妙峰山庙会的调查研究，为中国民俗学奠定了基石。此后，江苏的民俗学者以亲自到民间作实地调查研究为基本方法，不断贡献出以热爱家乡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特色的民俗学成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开展了群众性的提倡科学、破除迷信、移风易俗活动，但由于受“左”的思潮干扰，民俗学的科学研究遭到冷落乃至被否定、取消。1978 年 12 月 18-22 日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，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。在三中全会精神的强大鼓舞下，1979 年 11 月 1 日，以顾颉刚为首的 7 名我国著名民俗学家，郑重发出《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》。由此，全国各地民俗学的研究活动，如雨后春笋迅速兴起、蓬勃开展。我们江苏是最早热烈响应的，1980 年 4 月，在钱静人的支持下，穆恒在省首届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《恢复和发展民俗学》的发言；1981 年第 2 期《江苏社联通讯》又发表了他的《民俗学的重建和发展》的论文。接着，在省社联的指导下，江苏省民俗学会于 1984 年 8 月正式成立，并举办首届民俗学研讨会，这标志着江苏的民俗学研究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：全省民俗学者逐步组织起来，有计划地开展民俗调查、进行学术研究、培养专业人才、出版学术成果，并通过建立各有特色的民俗博物馆、举办民俗物品的陈列展览，向广大群众普及优良的民俗文化，倡导新时代的新风尚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俗学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作出贡献。

一、组织起来，建立学科基地

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，要有领头专家的研究成就，更要有—批学人的共同切磋。具体科研的个体性探索与协同合作的群体性研讨相结合，才有望在学科建设上获得突破性的创新。为此，江苏民俗学研究的振兴，首先抓了组织学术队伍、建立学科基地和办好学术刊物。

组织学术队伍，主要是通过学会将分散于全省文博界、教育界、民间文学界的民俗学者组织起来，以文会友，形成队伍，不断壮大。1984年8月江苏省民俗学会成立时，已发展会员192人，由吴白甸教授任会长，梁白泉研究员等任副会长。1986年11月苏州民俗学会成立，1990年1月扬州民俗学会成立，1991年7月徐州民俗学会成立，1992年10月连云港民俗学会成立，至此，我省苏南、苏中、苏北三块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区，都建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。省、市学会的会员总数已有700多人。与此同时，南京大学、苏州大学、扬州大学、东南大学等高等学校，先后开设《民俗学》、《民俗史》等专业课程，为培养民俗学研究人才作出了贡献。

建立学科基地，这是开展学术研究、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。在省民俗学会的积极推动下，南京博物院在1985年10月恢复民族部，主要担负我省民俗调查和民俗文物资料的征集、保管和研究工作。接着，1986年11月苏州民俗博物馆建立，以研究和展示江南城市民俗为基本任务。1990年更是民俗学研究基地大发展的一年，这年1月，正在积极筹备的南京民俗博物馆，在清代著名学者甘熙的故居开放6个展厅，显示出具有南京大都市气派的民俗文化。9月，无锡市民间艺术民俗博物馆正式开放，展出吴地近代的城乡民俗风情。这年还诞生了两个很有特色的研究基地：一个是在5月建立的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，陶思炎博士任所长，该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及东亚文化为研究对象，着重于中国民间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，并组织中外学术交流活动。另一个是在这年元旦正式开放的吴文化公园，这是由无锡县（今锡山市）堰桥镇农民创办的、展现江南吴地乡镇民俗风情的大型文化园林，同时还创办了民办的“吴学研究所”，由被誉为“文化愚公”的高燮初任公园主任兼研究所所长。这一批民俗博物馆和研究所的建立，使我省民俗学的工作有了依托的基地，并聚集了一支专门的、稳定的基本队伍，从而能够开展有组织、有计划的研究活动，产生高品位、高质量的学术成果。

办好学术刊物，这是发表研究成果、交流学术信息、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园地。在1981年1月，《乡土》正式出版，这是我省刊载民俗和民间文学资料及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小报，面向全国公开发行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接着，南京博物院主办的《东南文化》、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办的《东方文化》相继开辟“民俗学研究”专栏，重点发表高层次的精品力作，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高度的评价。此外，省民俗学会连续将学术年会的成果编辑成论文集出版，我省综合性学术刊物《江海学刊》、《江苏社会科学》，以及苏州大学等学报，也积极刊载民俗学研究成果，为民俗学的繁荣发展作出努力。

二、深入民间，重视田野作业

学界一般认为，现代的民俗学于1878年在英国创立，当时使用了“FOLKLORE”这个名称，即以“民众知识”表示“民俗学”，强调了这是关于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一门学科。其实，在我国古代典籍中，早就将民间的习俗风尚称为“民风”、“民俗”，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“命大师陈诗，以观民风。”汉代《风俗通义》著者应劭提出：“为政之要，辨风正俗最其上也。”统治者通过设置“观风俗使”，派到民间采风以察民情、资政治、安天下。正因为民俗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土壤中，民俗学者必须将深入民间、实地考察、采集第一手原始资料，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功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田野作业”。要强调的是，民俗既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，又有因时代、因地域、因民族的不同而形成复杂的变异性，我们既要重视发掘和利用历史文献的资料，更要重视调查和研究现时活生生的民俗活动，探讨种种民俗事象的文化内涵、表现形式、演变规律，使民俗学研究发挥好存史、资政、教化的功用。

一是重视文物考古的“田野作业”，研究古代的原始民俗。如在海安出土的易卦刻文，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，可以据此探寻易卦起源问题，为研究远古信仰民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又如在连云港将军崖发现的岩画遗迹，主要内容有人面、太阳、农作物和多种符号，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反映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石刻画面，在岩画前还有3块大石，为东夷民族以大石为神的土地崇拜遗迹。此外，在灌云大伊山、海州石棚山等地，还发现了有关生殖崇拜的重要遗迹，这都是研究江苏原始民俗的极为珍贵的资料。

二是重视社会生活的“田野作业”，研究民俗的流变状况。如近代著名学者陈庆年（1862-1929年，江苏丹徒人），通过亲身实地考察，于1908年刊印了《西石城风俗志》，实录了清末丹徒县西石城村的风俗面貌。1984年2月，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，组织学生又赴西石城村进行风俗考察，并撰写《西石城风俗新志》，从微观典型上作民俗流变的比较研究。1985年，

省民俗学会由刘兆元负责组织“渔民俗调查组”，在全省范围内对池河湖海的渔民俗作了系统调查，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1987年，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车锡伦副教授，组织学生在扬州、南通等地开展“农村民间信仰”的社会调查，撰写出30多篇调研报告。同年，省社科院文学所周正良等组织对大丰县小海镇的民俗风情调查，其成果《古镇小考》于1989年出版。1992年，镇江群众艺术馆康新民等组织人员到丹徒县石桥乡华山村采风调查，获得14万字的珍贵资料。值得特别提及的是，南京博物院在1983年确定吴县胜浦乡前戴村为民俗调查基地，该院民俗学者魏采苹、屠思华两位副研究员，长期坚持在基地蹲点调查，与当地群众生活在一起，就有关服饰、婚丧、民居、节俗、信仰等专题作持续考察，撰写了系列性调研报告，其中的《妇女服饰》，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

三是重视中外合作的“田野作业”，开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领域。例如，自1986年起，南京大学组织外国留学生到民间采风，已先后到无锡、南通、苏州、镇江、连云港等地考察民俗风情。1988年8月，日本民间艺术家代表团与无锡市的民艺、民俗学者联合考察“吴越地区民间文化”1990年3月，周正良、陶思炎等参加中日两国学者联合考察团，在我省常熟县和日本千叶县、冲绳县开展“农耕民俗文化”的调查，并出版了研究文集。近几年来，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又积极开展与日本、韩国民俗学者的学术交流。这些活动，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，丰富研究内容和改进研究方法。

三、潜心研究，力创精品佳作

“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”，既是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，也是科学的学术思想路线。我省民俗学者从科研实践中认识到：只有敢于探索，刻苦钻研，淡泊名利，力戒浮躁，踏实治学，持之以恒，才能抗得住外界的诱惑，耐得住冷遇和寂寞，在学术上有新的突破、新的开拓，奉献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和能流传于后世的佳作，有益于中国民俗学的更新和发展。我省在近20年的民俗学研究中，主要有三方面的学术成果：

第一是民俗资料的搜集、整理和编纂。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，也是紧迫的抢救性工程。代表性成果如：《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》，这是穆恒、陈秉生等对老工人长期采访实录并整理而成的，它以传统的民间歌谣形式反映了早期纺织工人，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劳动、生活和斗争状况，富有突破旧传统的新风尚色彩。《吴歌》，由金煦、姚世英、马汉民等精心采编，并附吴歌曲谱选和吴语常用方言简介，体现了当代学者对吴歌采集和研究的新成果。《江苏岁时风俗谈》，这是由王骤编著的关于我省岁时节令风俗资料的研究集成，作者对重要岁时风俗，逐一介绍其起源、旧时状况、现今演变，立足于树新风、扬美俗。我省还编著了一批地方性的风俗资料，如苏州博物馆的《苏州民俗》，韦振华等的《无锡传统风俗》，杨杰的《高邮风俗》，刘兆元的《海州民俗志》等。在此基础上，省民俗学会承担了编纂集大成的《江苏省民俗志》的艰巨任务，由梁白泉任主编，唐茂松、程德棋、赵志毅任副主编。该志分总论和行业民俗、生活民俗、社群民俗、礼仪民俗、教育民俗、岁时民俗、游艺民俗、信仰民俗，以及民俗学研究，共10个部分。全志现已成稿，并通过评审，即将正式出版。

第二是民俗学的专题研究。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，主要成果如：陶思炎的《中国鱼文化》，是我国第一部专论渔民俗文化的新著，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。刘兆元的《中国龟文化》，列入“域内外民俗学丛刊”。高国藩的《敦煌民俗学》、《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》和《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》，为敦煌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民俗领域，受到学术界重视，作者还应邀赴香港大学讲授《敦煌民俗学》。程德棋的《原始习俗与宗教信仰》，探讨了传统民俗的起源，进行中外比较研究，颇多新意。程德棋还与邹明诚等合作，翻译出版了英国著名民俗学家博尔尼的《民俗学手册》。徐艺乙主编的《中国民间美术全集》的《工具卷》和《用品卷》，探讨了民间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品的造型艺术意义，图文并茂。

我省民俗学者还重视编著高品位的普及性读物，如蔡利民的《中国民俗赏析》、杨晓东的《灿烂的吴地鱼稻文化》、蒋伟国的《民国三教九流》等，特别是高燮初主编的《吴文化知识丛书》，自1994年至今，已连续出版27种，内容涉及吴地民俗的众多方面，深入浅出，雅俗共赏，在弘扬传统文化，展示民间风情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，起了良好的作用。

第三是向社会转化学术成果，积极推动移风易俗，为革除陋习、发扬良俗、树立新风而努力。省民俗学会多次研讨如何积极发挥民俗学的社会功能，针对社会风气中存在的封建迷信、骄奢淫逸、金钱崇拜等不良现象，大力提倡健康向上、欢乐祥和的民俗活动，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。如苏州市举办了“文明婚礼”的评奖活动，将获奖的多种婚礼形式拍成电视片，

广为宣传，促进婚俗革新。无锡、南京、南通、扬州、徐州等地，都努力开发、利用本地的民俗文化资源，组织新型的庙会、灯会、船会、歌会等节庆活动，还促进了文化旅游事业发展。在欢庆香港回归祖国期间，我省民俗学者又积极探讨中西方民俗文化的交流，弘扬民俗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等课题，使民俗学研究更紧密地贴近现实，在继承传统中显示新的时代风貌。

四、办好展览，普及民俗文化

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也可以说都是“民俗生活”：百工行业、衣食住行、社会交往、四时八节、游乐嬉戏、生老病死、信仰崇拜……无不与相关的民俗紧紧结合着，但人们生活在“民俗”中，并不都能正确了解民俗的内容和形式，更缺少理解民俗的意义、价值和作用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会见到有些“民俗事象”是出于道听途说，以讹传讹，或者是盲目模仿，不伦不类。而一些早已被时代淘汰的陈规陋习，却乘机沉渣泛起、死灰复燃、污染了社会风气。为了普及科学的民俗文化，开展健康的民俗活动，我省民俗学者充分利用民俗博物馆的阵地，举办各具特色、丰富多彩的民俗展览，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观赏和积极参与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1982年1月，南通博物馆解放思想、勇于创新，在我省率先办起了《民俗品物展览》，在群众欢度春节期间，展出精选的220多件民俗品物，介绍春节的民俗习惯、传统的祈福观念、民间的工艺特色等，以浓郁的乡土情趣吸引了数万群众前往参观。1984年8月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期间，在会场上展出了刘兆元收藏的百余件民俗精品，再次引起全省民俗学者对展览活动的重视。1986年11月，苏州民俗博物馆建立，这是我省、也是全国第一个独立建制的民俗博物馆，建馆伊始即开设婚俗厅、节俗厅、食俗厅，展览引起了轰动，并接待外宾参观。1988年6月，该馆的“苏州灯彩”、“山塘看会”等，又赴新加坡展出，获得热烈赞扬。十多年来，该馆形成了人生礼仪、岁时节令和吴歌风情等基本陈列，接待中外观众近400万人次，成为国内著名的民俗博物馆，荣获“全国文物系统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的称号。

我省不少地方的文化单位，也从本地实际出发，积极举办各具特色的民俗展览活动。如南通纺织博物馆举办“纺织文化庙会”，连云港海州文化馆举办“婚俗展览”等。无锡的吴文化公园，更以创办大型民俗文化园林的气派，在整个西高山上办起了稻丰好、蚕桑巷、水鲜村、住俗馆、甲子厅、月老祠、崇庆庵、江南风情苑、福寿山庄，……，成为展示江南吴地民俗风情的集大成者。在南京，近年来有三个民俗展示区引人注目：一是以夫子庙灯会为主体的秦淮风光带，它正从传统的新春民俗活动，通过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名胜古迹、人文景观相结合，向整体的民俗文化、旅游经济迅速开拓，发展前景非常广阔。二是在甘熙故居建立起来的南京民俗博物馆，在先后开放的序厅、祝寿堂、岁时节令、建房习俗、风味小吃、民间工艺等展览的基础上，正在作全面规划、调整充实，将会有新的大发展。三是南京博物院加强了民俗研究所，并新建民俗博物馆，即将正式开放，大批历年珍藏的和近征集的民俗资料将公开展出，这里将成为我省开展民俗学研究、普及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。

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，我们祖国走过了改革、开放、发展的20年历程，这也是我国民俗学重建、创新、走向繁荣的20年。面对新世纪的曙光，我们祝愿中国民俗学更加灿烂辉煌。

（唐茂松，江苏省民俗学会副会长）

（责任编辑：方心清）